

112
✓

淳安文史資料



第四輯

88

政协淳安县文史资料组编

淳安文史资料

第四辑

YT152106



政协淳安县文史资料组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政协淳安县文史资料第四辑

目 录

前言..... (1)

政协淳安县委员会征集文史资料启事..... (3)

悠悠往事

——忆方海春.....沈素芒 (5)

乡情

——为《悠悠往事——忆方海春》补遗.....汪光盛 (13)

邵瑞彭.....县志办孙平执笔 (15)

王文典.....孙平 蒋岭 (18)

唐敦禄.....余允乾 汪金福 (22)

余家达.....余允乾 (25)

翁达.....管云长 (28)

陈仪与黄恺元.....方浩然 (31)

许汉章.....方浩然 (34)

革命老根据地——淳安.....余允乾 (35)

忆解放前淳安政界二三事.....朱汤铭 (38)

回忆在遂安时的二三事.....严济宽 (41)

淳安县自卫中队覆灭记.....管云长 (43)

抗日战争时期淳、遂两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概况

.....方绍乾 (46)

漫话淳安油桐.....卢良义 李友声 刘沛芳 (51)

淳安南枣.....绩溪 (55)

抗战前淳、遂两地茶叶经营概况.....何百永 (57)

新发现的关于方腊起义的碑文

.....吴伯宗 鲍绪先 (59)

遂安简师校史片断.....余侨扬 孙泽桢 (61)

淳安历史文物 (一).....鲍绪先 (65)

淳安 (含遂安) 县志修纂史略.....吴伯宗 (70)

解放前的遂安报纸.....蒋 岭 (79)

贺新凉.....吴无闻 (83)

七律.....胡树森 (84)

五律 游船过威坪故乡.....胡树森 (84)

七绝 游千岛湖.....张 鉴 (85)

七绝 千岛湖.....张 鉴 (85)

前 言

政协文史资料的征集和编印，是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为宗旨的。

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人。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等，都是人们创造活动的场所和成果。一切社会史料，说到底，就是人的活动史。因此，本辑史料把淳安人物列为主要内容。尽管本辑所刊方海春、邵瑞彭、王文典、唐敦祿等人的事迹虽属概略，但读完这些史略，使人感到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淳安也是人才辈出，不乏有志之士。他们或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民主革命，或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或致力于振兴民族经济，或为揭露官场黑暗而奋不顾身。

1988年5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我县已被定为革命老根据地县。在创建革命老根据地的过程中，既有淳、遂两地的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也有众多外地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其他革命志士。他们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淳安的解放。抚今思昔，我们对先烈、前辈的敬意油然而生。今天淳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往开来，为建设淳安、振兴淳安经济团结奋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业绩来告慰长眠于地下的英灵，告慰于正在安度晚年的前辈。

淳安地处山区，茶叶、油桐、山核桃、金丝蜜枣、山茱萸（中药材）等特产，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为此选编有关油桐、南枣和茶叶三篇文章，于读者或许有所裨益。

本辑共收集史料22篇，咏赞淳安山水人物诗词5首，总计45000余字。史料的撰写整理，除热爱文史工作的本地作者外，还有解放前曾在淳安生活、工作现定居外地的严济宽、朱汤铭等老先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方海春同志的夫人沈素芒女士，年届八十高龄，还为我们撰写了对方海春（即欧阳凡海）的回忆史料，县志办、党史办为本辑提供了重要人物史略，县档案馆为作者提供了重要档案资料。正是由于作者及有关单位的有力支持和协助，本辑文史资料才得以及时付印发行。

本辑由姚松涛主编，孙泽桢、吴荣德参与编辑。徐高霖、叶伯平、管云长等参加讨论修改。经王庆生、汪光盛、徐传元初审后，由余侨扬副主席审定。并由政协办公室的同志负责校对发行。在这里，我们对上述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作者、读者批评指正。

政协淳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

1988年12月

政协淳安县委员会征集文史资料启事

征集文史资料是保存史料、承先启后、团结人民、教育后代、促进祖国建设和祖国统一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县政协成立以后，即着手文史资料的编辑。几年来，由于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已征集到各类资料百余篇。我县素以山水秀丽、物产丰富、人才荟萃著称。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不少志士仁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救国救民，振兴中华，前仆后继，慷慨贡献。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淳安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统一和繁荣富强，为争取祖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搞好社会改革，振兴淳安经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其中可供后人学习铭记、继承发扬者，实属众多。现已征集到的仅是其中极少部分。

为了更好地抢救、积累和保存历史资料，以传诸后世，教育后人，并通过史料编印发行以激励人们爱国主义热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振兴中华，促进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服务，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服务，我们将继续坚持淳安近、现代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敬请淳安（含遂安）籍和以前在淳安工作过的各界人士，继续大力协助。现将有关事项开列如下：

一、提供或撰写之史料，务必以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为宗旨，务必坚持求实存真的原则。有关淳安重大历史事件的史料，具有爱国表现或在各方面有所建树、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的人物史料，只要符合上

述宗旨和原则，均在征集之列。

二、以辛亥革命至“文革”前各个历史时期的资料为主，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文艺、体育、医药、司法、民族、宗教、侨务等方面。如有需要，时间上可上溯下延。

三、以本人亲身经历和见闻为主。对确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及收集整理的稿件，也酌情收录。属收集整理的资料，务请注明来源和出处。

四、经《淳安文史资料》选用之稿件，尊重作者的观点，编者仅根据需要予以节录或作文字修改。一经刊出，酌付稿酬。

五、欢迎原始资料的赠送、转让、借予。对转让的资料，根据价值大小酌付酬金。

六、资料文稿请逕寄政协浙江省淳安县文史资料组。

1988年12月

悠悠往事

——忆方海春

沈素芒

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了。我在严州（建德）上初中，后来又在杭州上高中。我们班上有一个瘦瘦的同学，功课最好，可是每次闹学潮总是他带头，要不是几位老师保他，差点被开除了。他就是方海春。他经常帮助我复习功课，象对待小妹妹一样关心我，保护我。

1935年，方海春从日本回来，他母亲托人到我家提亲。我父亲是建德县一个不大不小的财主。听说海春是日本留学生，以为他家里必定很有钱，又看我的态度很坚决，于是就答应了。其实他的家境并不好。他家庭的那些曲折故事，是后来我才逐渐弄清楚的。

方的祖辈住在遂安（今淳安）八都上坊村，离县城50华里，到处崇山峻岭，交通闭塞。1911年，八都一家姓方的财主，父子俩先后去世了，留下三位寡妇——两个婆婆（大婆余克成，小婆吴连鳌）一个媳妇。媳妇是广丰县北门乌林街人，名叫周瑞仙，当年本来是这家的丫头，几个月前为了给病危的公子方大勋（乳名尚彰）“冲喜”，才匆匆结了婚。男人一死，家产的继承权发生了问题。居心叵测的亲属，为了霸占这份家产，给婆婆出主意，要卖掉这个媳妇。媳妇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她剪去发髻，以示抗拒，同时宣称自己已经“怀孕”

了，并作了“假肚”。第二年正月，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海春（实际上是从本乡彭家庄一户农民家抱来的）。有了继承人，别人就没有办法了。风波平息了几年之后，不料机关泄露，族人得到消息说方家媳妇根本没有怀孕，海春是从别处买来的。于是，族人密议，要杀孩子，卖媳妇，霸家产。两个婆婆吓坏了。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孙子，不管是否亲生，她俩已经对他产生了感情。媳妇也挺孝顺、能干，媳妇和孙子是她们的希望所在。可是，两个妇道人家，又有什么办法呢？危急关头，还是媳妇有主意。她一面让婆婆去求情，谈条件，作为缓兵之计；一面紧急布置，乘对方不备，带着儿子、地契，雇大挑着几担银元，连夜逃到七都儒洪村（今大市镇）投靠义妹余络英。后来又把婆婆也接去了。在儒洪住了几年，总不放心，又在遂安狮城镇买了一幢房子，一家人，连同这位义姊，搬到了县城西涧。这位义姊，海春叫她大姨，我也叫她大姨。她疏财好义，终生不嫁，一直跟海春的母亲住在一起，直到1948年去世。

海春的母亲凭自己冒险保住的一点家产，省吃俭用，下决心供儿子读书，目的是希望他将来做官或做生意，挣钱发家，光宗耀祖。可是，她没有想到，海春却走了另外一条路。上中学的时候，他就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喜欢读鲁迅的书。1929年到上海后，开始与中共外围组织“社联”接触。1931年加入“社联”，后来又转入“美联”。他在沈钧儒主办的法学院学过法律，又在上海新华艺专西画系学过绘画。1933年东渡日本，进了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并与一些进步同学一道，和国内的“左翼作家联盟”建立了联系，在东京也组织了“左联”。他担任过东京“左联”的书记和“文总”的组织部长，与陈学仁、林林、林为梁（即后来在新疆牺牲的林基路）等同志一

道，编辑出版过《东流》等文艺刊物。1936年，我们在杭州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两家的老人当然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一个留学生，回国以后应该飞黄腾达了。

可是，他们看到的却不是飞黄腾达，而是担惊受怕。我们结婚以后就到上海，在徐家汇租了一间亭子间。海春成天读书、写作，经常参加进步文艺界的活动。当时“左联”已经解散，进步作家都团结在“全国文艺家协会”周围，海春是“文协”的秘书。有些活动我也跟着去，但有些活动他不让我参加，因为那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当时周立波常到我家来，特别是我有了孩子以后，立波夫妇常来看望。当时我们生活很苦，没有固定收入。有一次买了一块肉，我一面煮一面尝，没等海春回来，肉就尝完了。为了帮助我们维持生计，茅盾介绍海春搞点翻译。当时译过一部长篇小说《垦下》，曾用欧阳凡海、茅盾合译的名义登过广告，可是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译稿被生活书店丢失了，没有出版。为了避免家庭受牵累，海春参加革命活动以后，一直用欧阳凡海这个笔名发表作品，后来欧阳凡海就成了他的正式名字。他在日本和上海写的一些短篇小说，大都取材于故乡农村的一些人物和背景。我手头保存的有曾在《东流》、《东方》等杂志上发表过的《好调伯》、《竹叶刀记略》等篇，近来翻出来看看，仍能感觉到浓厚的乡土气息。

当时，“文协”的主要负责人是周扬同志。1937年春，周扬调去延安之后，曾由凡海负责过一段时间。不久，爆发“八、一三”事件，日本侵华战火烧到上海。我们带着孩子同疏散的人群一道挤上火车，回到故乡。在家住了几天，把不满周岁的孩子交给凡海的母亲，我们就离家走了。说的是到“大后方”去教书，实际上是去延安。

到了延安之后，组织上分配凡海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当时的边区政府主席是张国焘，秘书长是伍修权。我呢，进了陕北公学，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到延安不久，凡海就咳血。经马海德医生检查，确诊为肺结核。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比较差。组织上为了照顾他治病，同时也考虑到“大后方”工作的需要，就安排他到“国统区”工作。1938年春天，我们离开延安，经西安、武汉到了桂林。那时，桂系态度比较好，在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帮助下办了广西地方建设干校，凡海被安排在那里担任指导员。他还在“日本人反战同盟”担任过秘书兼顾问室代主任。当时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在桂林，写了一个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给日本人民带来苦难的话剧《三兄弟》由凡海译成中文，演出后引起很大反响。凡海也写过一个四幕话剧《抗战第一阶段》，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连载过。

在桂林的这段时间，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比较安定，使凡海能集中精力夜以继日地撰写鲁迅研究专著《鲁迅的书》。这部二十余万字的著作，对鲁迅各个时期的作品作了系统的评价，分析了时代背景，探索了鲁迅思想发展的脉络和作品的重大意义。这样大部头的系统研究鲁迅作品的专著，以前还没有过。在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景宋（许广平）的很多帮助。我当时在小学教书，课余时间就帮凡海抄书稿。我感到，字里行间充满着作者对鲁迅的热爱和尊敬。我过去也读过鲁迅的作品，但是理解不深，有些甚至读不懂。通过抄书，看了凡海的分析，使我慢慢理解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阿Q正传》中的人物一个个作了分析，使我很受启发。那时艾青常来，在他的鼓励下我写过两篇小东西，他拿去给发表了。艾青鼓励我继续写作。但是，我看凡海太累，身体不好还拼命写东西，为了分担他的压力，我宁肯放弃写作，帮他抄稿子。1942

年，《鲁迅的书》在桂林由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后来在东北解放区重印过。最近我看到有些书，回顾鲁迅研究的历史，还多处引用它。

1941年，凡海调到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的编辑和《群众》的编委。我给报社的工人同志们当文化教员，凡海常常去找一些文化界人士约稿，自己也写过一些文艺方面的评论。这些评论，1943年曾集编为《文学评论》在重庆出版。前不久，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运动史料选》也收集了他当时写的一些文章。

当时接触的文化界人士，他特别佩服郭沫若。他在日本就认识郭沫若。他说郭沫若这个人真是热情洋溢，爱憎分明。当时郭老虽然失去了党籍，算个民主人士，他对共产党的信念一如既往，坚贞不渝。凡海比郭沫若小二十岁，是晚辈，但因为是共产党方面的人，所以郭沫若对他很热情，很尊重，视为忘年之交。国民党有些达官贵人，虽然地位很高，但郭沫若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有时不冷不热地应付几句，有时发起火来甚至破口大骂。凡海就亲眼见过郭沫若把一个来收买他的政客踢走了。

重庆工作期间，使我们有机会直接接触周恩来同志，这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凡海在文艺界的活动，有些是周公亲自布置和指导的。凡海写的评论，凡是重要一点的，都要送周公过目。恩来同志审稿，一字一句甚至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工作那样忙，真可说是千头万绪，但事无巨细，只要经过他，就必定一丝不苟，万无一失。在重庆那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只要有周公在，大家就感到有了主心骨，什么也不怕了。他的坚定、亲切、明智，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品格。后来，那么多民主人士都跟着共

产党走了，除了党的路线正确以外，周恩来同志的影响可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凡海说，接触周恩来同志以后，他才知道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了不起的人，才认识自己的平凡和渺小。周公对干部是非常关心的。1943年，我们调回延安，几十个人与周公同乘一辆大卡车。周公坐在驾驶室，我们坐在车上，车上有个帆布篷，挡不住风雨。遇到下雨，周公就让我们女同志去坐驾驶室，他自己上篷车。凡海在重庆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描写几个对国民党抱着幻想的年青人，受特务欺骗压迫，经过种种曲折，终于投向了共产党。离开重庆的时候，凡海舍不得把稿子丢掉，但又怕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搜去。周公知道了，就把稿子拿去放在他的皮包里。因为他是共产党的正式代表，又是“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特务不敢搜查他。书稿带到延安，后来经过多次修改，解放后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就是长篇小说《无辜者》。如果没有周公的关怀，这部书稿也许早就丢了。1948年，凡海在华北解放区农村搞土改，突然大吐血，一吐一天盆。当时那种环境，根本弄不到药。万般无奈之下，我们想起了周公。凡海给周恩来同志写了封信，想不到两个月之后，辗转从香港买来了药品。如果不是周公的关怀，凡海也许就没有此后三十多年的生命了。每念及此，感激难已。

到了延安，我们就参加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凡海在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文学研究室的副主任、主任。经过整风，使我们进一步成熟起来了。特别是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对凡海启发很大。他说，过去在日本的时候，几个年青人在一起，虽然热情很高，但是也很幼稚。常常凭某人的表情、长相，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一次任白戈同志从上海来，要接关系，有个同志跟他接触以后，认为很据他的言语、表情，感到不可

靠，不能同他联系。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完全是唯心主义。当时同志间的许多纠纷往往是这样引起来的。通过自觉的反省，愈益认识到毛主席实事求是的路线、政策，真是英明伟大。这是当时同志们普遍的心情，发自内心的感受。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离开延安，向张家口进发。当时我们身边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因此发给一条毛驴，把孩子和行李驮在驴背上。我们这支队伍，都是“文化人”，书多，孩子多，女同志多，与一般队伍不一样。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到了张家口。那时，大家情绪很高，也忙得很。凡海在华北联大教课，又兼《时代青年》杂志主编，又帮助工会工作，又担任参议会选举委员会二区选委兼宣传部长。他那时很瘦，天天感到疲倦，发烧，晚上回家躺下就不想动了。那时根本顾不上到医院去检查。

1946年秋天，从张家口撤退。我们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向冀中转移，途中参加西加斗、阜平、束鹿等地的土改工作队。凡海从小在农村长大，又参加过延安整风，很容易和农民接近。工作起来，他就一切都忘了。往往深更半夜还与村干部一起围着火炉开会，烟熏火燎，一面咳嗽，一面讲话。有一天，突然大口吐血，吐了半脸盆。后来，实在坚持不了啦，才回到正定，住在华北大学养病。进北京以后，经过检查，发现一瓣肺叶已经烂掉。虽然经过多方努力，还在阜外医院动过大手术，但一直未能彻底治好，因此再也没有担任过什么工作。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他是代表，没有出席。养病期间，除了整理出版《无辜者》以外，主动要求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后来，送来了一些书让他审阅提意见，杨沫的《青春之歌》原稿就经他看过，刚进北京的时候，他用《无辜者》的稿费在西城区买了一幢房子。住在家里，别的事干不了，他又研

究甲骨文、金文，断断续续花了十几年功夫写了一部三十万字的《新说文解字》。“文化大革命”来了，这个卧床不起的病人也未能幸免，经常有“红卫兵”、“革命造反派”逼上门来，要他交代与“三十年代黑线人物”的关系。医疗条件也明显恶化了。1970年，他终于离开我们。四年以后，他那含辛茹苦、历尽沧桑的母亲也去世了。

岁月匆匆，往事悠悠，一晃又十九年过去了。前几年我天天忙自己的事，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事，但也在忙着，顾不上回忆。现在老了，无事可干了，只有用回忆来填补空虚。可是，脑子不灵了，笔也不好使了，只好让孩子们动手，整理出这样一篇，聊以自慰。

一九八八年七月写于北京

乡 情

为《悠悠往事——忆方海春》补遗

汪光盛

解放初期，小说《无辜者》出版发行，人们争相传阅，当时就听人说，作者欧阳凡海就是方海春，是遂安（现淳安）八都上坊村人。我常怀着敬佩而自豪的心情向周围的人们夸耀：不简单，我们县里出了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了。

1963年，我调到方海春同志的故乡——上坊公社任社长，“文革”后任书记，直到1978年才调离，在上坊整整工作了15年。

方海春在故乡留下的唯一财产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楼房，建筑面积约有400平方米。位于上坊村的中心。解放前，由方海春的乳母家（即方大福家）使用两间，并负责代管整堂房屋。解放后，该房先是由上坊村集体代管，用于设立村农会、民兵队、农业生产合作社、大队管委会等村级机构。五十年代末，根据多数群众的意见，想将上坊管理区（基层政权机构）从西园村迁至上坊村，但因没有公房，所以就由当时大市人民公社上坊管理区书记儒德兴去信北京，向方海春商借房屋。方海春亲笔复信，明确表示：我的房屋任何个人不得侵占，由当地政府代为保管，无偿使用。此后，先后由上坊管理区（后改为公社）、供销社使用。1976年后，用于公社工作人员宿舍及杂物仓库。

1984年，由于公社公房已建成并基本配套，方海春家的房